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合订本
〔第三十五册〕

合订本 第三十五册

(总101—103)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长冀 周钩美
梁志安 吕长赋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35册)

(总101—10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 装订

※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21.75 字数：542千字

印数：1~32000册

统一书号：11224·157 定价：8.80元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总10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目 录

敬告读者 本 社 (1)

南洋杂忆 胡愈之 (1)

桂林——香港——新加坡

我与《南洋商报》

从撤离围城到重归星洲

《风下》与《南侨日报》

·军 事·

刘公岛上的风暴 毕昆山 (28)

汪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水牢烈火——酝酿暴动

——酒后失言——聚餐折箸——日军巡查

——身陷囹圄——求成心切——狂飚突起

——攻击辅导部——智取基地队——轻取西炮台

——席卷派遣队——栈桥歼敌——解放海员

——暴动成功——投奔八路——龙须反正——

文西命名——牙山会师——征程万里

·政 治·

中华革命党始末 施方白 (73)

浩然军事学社的开办与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中华革命党的言论机关

沪军镇守使郑汝成伏诛

吴先梅剪除蒋士方

策反苏州独立的曲折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陈其美的补遗

尾 言

北伐亲历记 赵春珊 (89)

北伐前夕的武昌、安阳

北伐盛时的武汉市

北伐失败时的湖北、河南

略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杨玉清 (109)

·科 教·

旧中国西部惨淡艰危的科学活动 黄伯易 (115)

馋涎欲滴——旗开得胜——“群英会”——

“群儒舌战”——高潮和风波

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 金宝善 (125)

张孝骞与湘雅医学院 周文斌 (139)

·人 物·

爱国主义学者白鹏飞 白一璧 (147)

艰难求学——正义为师——效力桑梓——

激浊扬清——颠沛流离——晚年后事

关于白鹏飞事迹的一些补充说明 黄贻平 (169)

“民主教授”——“大炮”的由来——关于

广西建设研究会——“皮蛋博士”和“蚊

子博士”——不容忤逆

“和平老人”邵从恩 彭静中 (172)

溥杰自述 溥 杰 (185)

家庭环境与教育环境

在英美和日本之间徘徊

封建主义思想对我的“加工”

伪满宫内的形形色色 万嘉熙 (201)

初到伪满——我和溥仪——伪宫内府的

概貌——伪满时期的溥仪——逃往临江——

在沈阳机场上——结语

敬 告 读 者

《文史资料选辑》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综合性史料刊物，是在周恩来同志倡导下于一九六〇年创刊的。原系内部发行，为适应新的形势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自一九八五年第一辑（总101辑）改为公开发行。

本刊所刊资料，绝大部分为具有丰富阅历的知名人士所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之故实，内容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时限上起清末戊戌维新运动，下迄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近现代史的活的资料，可弥补历史文献之不足。

本刊的编辑方针是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方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征集和选刊在近现代史上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和各行各业中有所建树的人士的资料；同时，也从各个侧面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实际，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增加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从而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本刊选刊的均属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素材，因此，不强求观点一致，体裁一律，只要内容有史料价值，即予选载。由于撰述人受思想、环境、记忆的种种局限，所述不尽翔实，或是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叙述，互有出入，甚至有某些内容与文献记载不一致；但只要是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言之成理，持

之有故，就可以各说并存。发表出来，供历史科学工作者进行综合分析，考证异同，辨明真伪，作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同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质疑，补充，订正，通过大家的努力，以达到翔实的要求。

本刊公开发行以后，改变历年累计排号的办法，每年出版六辑（第一辑至第六辑），更换一次封面。保留原书名，保留总辑数，以便于读者配套和扩大征订。

二十多年来，本刊在各界人士、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成绩。恳切地希望大家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随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把《选辑》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八五年一月

南 洋 杂 忆

胡 愈 之

编者按：本文追述作者在南洋七年余的生活：一九四〇年去南洋参加《南洋商报》工作；日军侵占南洋后，流亡苏门答腊，隐姓埋名；抗战胜利，有国难投，继续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南侨日报》，宣传和平民主。过去《选辑》有关南洋生活斗争的回忆录不多，本文弥足珍贵。

我在《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一书里曾说过：“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我平生除了为追念亡友写过一些纪念文章外，几乎不写回忆文字，即缘于此。现在，我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许多朋友都希望我写些往事的回忆，帮助年轻人了解过去的生活和斗争。事实上有不少同志已在做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有关南洋的许多事情的回忆文章却所见不多。我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赴新加坡，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星马沦亡期间，和一批进步文化人流亡苏（门答腊）岛，凡三年零八月。之后，又重返新加坡，直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离新经香港返国，我总共在南洋生活工作了七年余。那七年，不但是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七年，也是我国人民浴血奋战，摆脱内忧外患，使旧中国蜕变成新中国的关键性的七年，对于我个人，更是难忘的七年……

一、桂林——香港——新加坡

一九三九年，我从沦陷后的武汉辗转来到桂林，参加范长江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工作，同时筹备“文化生活供应社”。

记得是文化生活供应社开张的那天，我正在供应社楼上我的住处与同志们欢聚庆祝。忽然，李克农同志来找我，说飞机票已买好，要我马上飞香港。当时国内正是“皖南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蒋介石准备同日本人秘密媾和，日本叫蒋介石将共产党、新四军彻底打垮。我党中央曾有密令：为保存力量，凡是不能秘密隐蔽起来的同志，都必须立刻转移埋伏。而象我这样的人，是无法“秘密”起来的。

飞抵香港后，我即去找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人廖承志同志，原来要我去新加坡办报，当《南洋商报》编辑主任。

《南洋商报》是陈嘉庚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创办的，这时已换了主人，全部股权归大实业家李光前（陈嘉庚女婿）及其弟李玉荣等所有。陈嘉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

“余自民国光复后，矢志为国家社会服务，冀以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故自农工商业而及于教育，旋并创办《南洋商报》，故为商业战之先导。迨民国二十三年初，因世界不景气之影响，各业损失额巨大，致有限公司收盘，《南洋商报》遂亦易主，而与余脱离关系矣”。①

尽管股权易主，掌握经营管理和舆论方针大权的董事经理傅无闷，却以一个老报人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敏感，从扩大报份销路出发，使报纸成为拥护筹赈爱国运动、拥护南侨总会、拥护陈嘉庚的喉舌，以适应广大爱国华侨的要求，与同业竞争。该报编辑

① 见陈嘉庚《告读者》。刊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侨日报》。

张楚琨一九三九年秋，以《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身份回国采访抗战新闻，同时接受傅无闷的委托，在国内物色一个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人士，担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张楚琨是一个进步记者，主编该报副刊《狮声》，很受读者欢迎。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同志多次，请周恩来同志推荐编辑主任人选，党组织内定了我，由南委廖承志同志办理具体事宜。张楚琨曾把经过详情告诉我：

“一九三九年秋，国民参政会开会，我以《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身份到重庆采访，偕同《南洋商报》特派记者高云览，多次会见周恩来副主席。我介绍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南侨总会、特别是爱国华侨领袖的情况。周副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和关怀，指示：对于陈嘉庚这么一个为华侨所拥护的爱国华侨领袖，我们应该尽力协助他，爱护他。周副主席高瞻远瞩，认为陈先生只要了解国内抗战真象，了解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定会使他明辨是非，全力支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副主席又问需要我们怎么样帮助？我建议加强舆论阵地，并说到《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要我物色一个有影响、有声望的编辑主任，以改变商报面貌，扩大销路。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位众望所孚的新闻权威人士，一定能帮助陈嘉庚先生的抗日筹赈运动。周副主席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叫我去香港找‘小廖’（即廖承志）商量。

一九四〇年九月，我参加‘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任务完毕，即将离渝返新加坡，周副主席写了一张条子，叫我带给廖承志同志。廖承志同志提出您胡愈之的名字，我认为非常适宜，傅无闷经理一定会同意。因为您胡愈之所写的国际问题的文章在南洋风靡一时，《莫斯科印象记》影响很大，又是《东方杂志》的主编，陈嘉庚先生曾在那杂志上发表过自传……廖承志同志为能这样一拍即合很高兴，事情就算定了。”

我当时不是公开党员，虽然我三十年代就入了党，但是我写的进步文章，南洋的报人和读者都知道，公开去新加坡很不容易。因为这是政治斗争，国民党也想占领舆论阵地，也准备派人

去南洋办报，拉拢华侨群众。一般象我这样的人去新加坡都是坐二等舱，坐二等舱需要办护照，而护照要向国民党当局办，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我。名字可以改，相片却无法改。我只有坐三等舱、统舱去。坐三等舱不用护照，但必须在新加坡附近的一个小岛（旗章山）上扣留一礼拜，名义是检查有没有传染病，实则是专为穷苦百姓而设的一种侮辱性检查。廖公很精明，他事先叫我找一个英国医生看病，让医生开条子证明我没有病，实际是给一百块钱买一张证明。这样，我出示英国医生的证明，就可以免去检查的侮辱，合法上岸。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也厉害，他们对我的情况也掌握一些，曾电告英殖民当局：胡愈之坐三等舱去新加坡，设法不许他上岸。三等舱条件很差，空气污浊，拥挤不堪，食物特差，没法吃。但是可以去二等舱吃饭，另外花钱。我与王纪元同行，在去二等舱用饭时，极凑巧地碰见了张楚琨的小女儿咏莹。她当时才四、五岁，长得很象她父亲，我看着觉得面熟，就逗她讲话，才知道楚琨夫人吴梅丽就在船上。我们一路彼此照应，终于平安抵达新加坡。

在新加坡上岸第二天，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南洋商报》刊出我和王纪元两人合照的照片，附志新闻介绍如下：

“本报新聘国际问题权威胡愈之先生为编辑主任，

聘名记者王纪元先生为编辑，二氏均已开始视事，本报

暨《新国民日报》同人昨在大同酒家设宴欢迎。胡氏服务

国内出版新闻界十数年，经验极为丰富，对本报有不少

革新计划，本月内将作初步改进，迨明年一月本报将以

崭新的姿态与读者见面。”

英殖民政府见报吃了一惊，胡愈之怎么来的？怎么没有查到？他们于是通知报馆，叫我去华民政务司（英殖民当局所设专管华侨的机构）谈话。假定说我不是合法上岸，或者叫他们查出一点什么小毛病，就将被控为偷入境，他们是可以叫我原船返回的。报馆懂得他们这一套，马上为我赶印了一批名片，我就带着

这名片去华民政务司谈话。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我递给他们一张印着“胡学愚字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的名片。他们又问：“你是怎么来的？”“因报馆要我火速启程，来不及办护照，我只好坐三等舱，但是合法上岸的。”

英国医生要了我一百块钱就不提了，给他们留点面子。他们为什么没有查到我胡愈之呢？因为我一路上都是用胡学愚——这是我的本名，我很少用它，知道的人就更少了。他们也知道中国人的名字很复杂，又是本名，又是字，又是号，一般为了表示尊敬都称字。我用胡学愚既不是化名，也不是假名，至于他们不知道胡学愚就是胡愈之，只能怪他们孤陋寡闻，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只能让我留下。沈兹九是第二年来的，坐的也是三等舱。她从皖南事变中侥幸逃脱出来，没有地方好去，就上南洋来拓荒。周恩来同志想得很周到，叫她来协助我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密切，相互间渐渐产生了感情，我们不久就在新加坡结婚了。此外，还有乔冠华和郑森禹同志，也是第二年坐三等舱来南洋，但是英殖民当局就是不准他们上岸，硬说他二人的名字是假的，而原来的真名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因为乔冠华曾用“乔木”做笔名，他们就说他是延安那个著名的中共政论家胡乔木），结果郑、乔二同志只有徒劳往返，又乘原船回去了。

在我就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恰好一个月的时候，陈嘉庚先生从祖国返回新加坡了。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全国各地慰劳视察了九个月。在李铁民、侯西反的陪同下到延安访问了九天，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长谈多次，明白了国共摩擦的真相，深为延安军民一致、团结抗战和民主化的新气象所感动，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化，“蒋介石狡诈独裁”

相比较，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他明辨了是非，终于由一个坚决的拥蒋派转变为拥护共产党了。事实完全证明了周副主席的卓见和预言。陈先生经过仰光，沿着槟城和马来亚各大城市南下，宣传团结抗战，说明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受到各侨团和侨众极为热烈的欢迎。到达新加坡恰好是一九四〇年岁尾最后一天。陈先生想不到我已来新加坡就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见到我高兴极了，对怡和轩的同人连声说：“深庆得人，深庆得人！”

二、我与《南洋商报》

新加坡简称星洲、星岛，又称狮岛，日本占领期间曾一度改名昭南岛。这里不但是南洋华侨最集中的地方，亦是英帝国的军事重镇，并已成为海外一千一百万侨胞反侵略运动的中心。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面临最后的严重危机。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危急局势，日本不得不一面向中国的投降派采取诱降办法，捧出汪（精卫）记班，施挑拨离间的毒计，对中国发动“政治攻势”；另一方面则准备再来一次对中国的规模军事进攻。面对敌伪顽固反动势力的威胁利诱，重庆当局显得软弱动摇，心怀叵测。国统区内一片乌烟瘴气，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腐败黑暗，官吏贪污溺职，还不时制造国共摩擦。广大爱国华侨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抗战的前途，忧心如焚，对党派之争极为反感。但是，由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国民党在南洋华侨中影响很大，公开的骂或捧都不受欢迎。我们反正是为了抗战，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抗日人人都欢迎，我们就专讲一致对外，抗日建国。

当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除了《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还有销路不大的《总汇报》等。福帮——福建人大都看《南洋商报》，广东人多喜读《星洲日报》，而《星洲日报》的老板胡文虎却并不是广